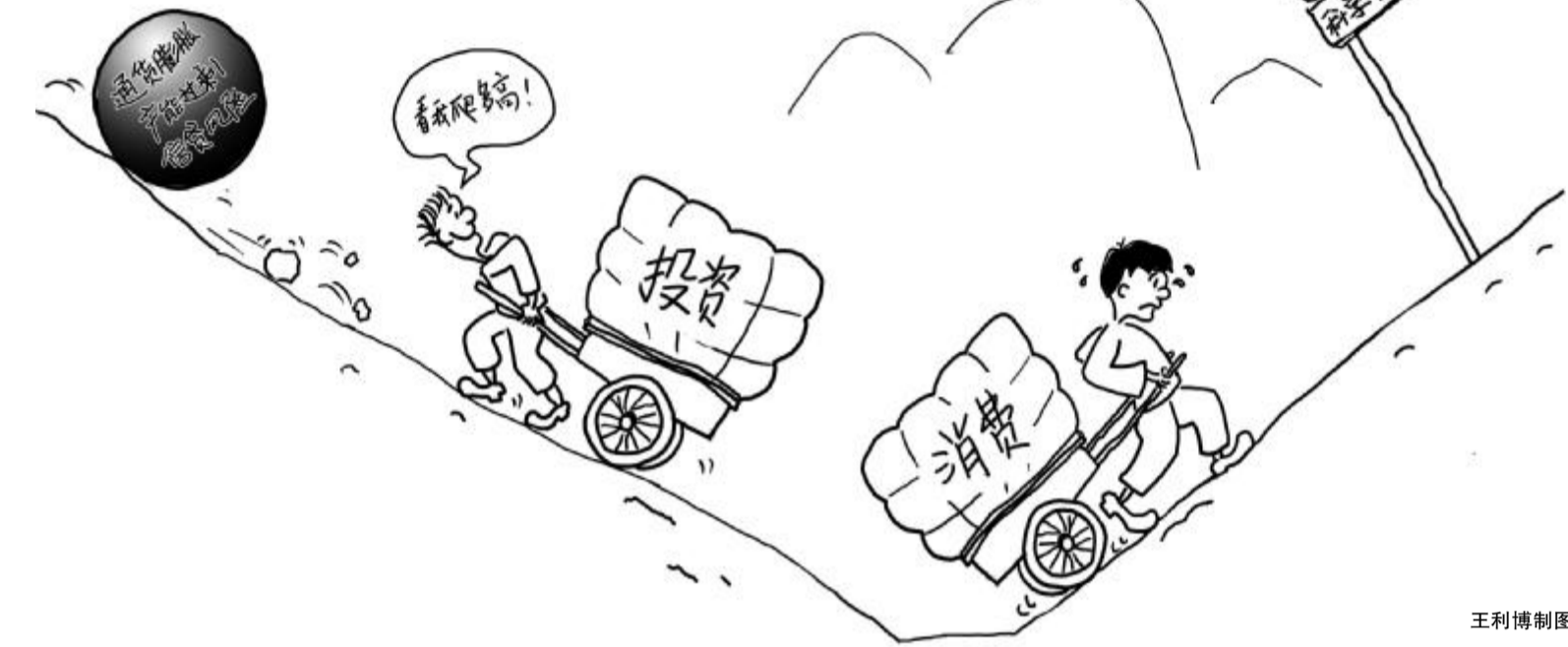


投资主导还是消费主导 是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分野



王利博制图

■ 王敏

是继续坚持投资主导，还是转向消费主导，这是中国发展理论分歧的焦点，将决定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不久前，就吴炳新的《消费通论》、《领导科学管理新论》等著作出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举办“消费主导经济与领导管理科学创新高峰论坛”，围绕扩大消费这一焦点问题讨论，使得这个重大议题的讨论更加明朗，更加尖锐。

投资“保增长”与消费保增长是当前发展思路的主要矛盾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而且把扩大内需放在“牢牢把握”的第一条位置。然而，近来以投资主导保增长的趋势日渐抬头，令人注目。

“消费问题解决不了，社会就潜伏着危机，社会发展就不稳定。”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说。

“所谓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消费不能转化成货币，货币价值、消费资料不能实现，就不能购买生产资料，两大资料交换中断，就会出现危机。”李连仲表示。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锦认为，对于经济衰退，凯恩斯所开出的药方主要就是增加政府投资，刺激需求。在短期内，政府把公众未来的支出需求转化为了现在的新的需求，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有利于保持需求水平的稳定，可以起到刺激经济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所以说，凯恩斯的反衰退政策对于经济依然起到正面的刺激作用。但从长远来说，则是一种错误引导。

中央财经大学国家管理学院院长、博导赵景华认为，高投资不仅造成投资消费失衡，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避免地与高风险相伴，“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

循环。近两年投资迅速增长，资金来源主要来自银行信贷，导致银行贷款规模急剧扩张，潜伏着风险，同时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衍生的巨额流动性，也成为滋生房地产资产价格膨胀、通货膨胀和债务膨胀的诱因。

消费是目的还是手段，是理论分歧的焦点

中国学界关于消费主导的理论是从2008年8月开始的。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员吴炳新是消费论的主要研究者与提出者。他以《消费通论》、《领导科学管理新论》等著作出版，组织三次消费主导论研讨会。吴炳新认为，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投资拉动效果趋弱的新环境下，中国已进入消费经济为主导的新环境，在以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向消费主导经济战略转变中，应当首先转变领导管理方式，重视消费理论创新，变投资拉动为消费拉动，重塑围绕消费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刘海藩认为，刚刚出版的《领导科学管理新论》，把消费论研究引向领导科学领域，是一本深度开掘的消费论著作。

李锦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处在一个历史拐点上，这就是以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向消费主导经济战略转变。目前，我们国家患上“投资依赖症”，难以走过这个历史拐点。症结在于指导三驾马车的理论是凯恩斯理论，把消费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消费主导论，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源头和动力，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又颠覆了凯恩斯理论，消费主导论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对于转变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指出，在当下三驾马车经济里，消费是工具，只是一种手段。当经济增长需要它的时候，就会重视它，当经济增长不需要它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会被扔在一边。这种思维有一种惯性，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往往是就消费抓

消费，消费总也抓不起来。

消费本位还是生产本位，决定理论创新的基础

“如何能转向以消费主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需要领导管理者从生产决定论及凯恩斯局限性理论转向正确的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其公式为：消费—科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吴炳新表示。

传统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公式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把生产放在首要的地位来认识。吴炳新的理论公式是：消费—科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圆周螺旋发展公式，结论是消费决定一切。消费处于源头地位，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地位，这是一种唯物论的认识路线，李锦这样认为。

我们整个经济学体系是生产本位，而不是消费本位。经济学一上来的定义就是配制稀缺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所以现在整个经济学是为了生产服务的，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效率。走到凯恩斯这一步，他把消费的目的变成工具，这就是导致我们消费长期以来难以扩大在理论层面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戴园晨说，消费主导论的发展，有其外部的原因，也有其内部的原因。从宏观上说，它是在中国改革的年代里逐渐完善起来的，它顺应了改革的历史大潮。从微观上说，它是学者精心研读、不断思索的结果。

是科学发展还是GTP增长主义，决定领导思维的价值取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夏禹光教授说：长期以来，领导科学与管理学人为分家，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现在扭转了这种学术畸形。把领导科学与管理学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在学术上开辟一个新局面。

刘海藩认为，吴炳新将领导与管理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论述了领导与管理的辩证关系，这确实是一个创新，

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鑫生说，《领导科学管理新论》是一部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著作。目前，国家发展战略由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这个过程还没有实现与完成，消费并没有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从我国实践来看，只有消费拉动有实质性进展，国家发展战略转变才有可能破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徐东华说，正确处理消费与投资关系是一个大课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也包括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公共服务导向，内涵极为丰富。这里存在着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转型。

李连仲介绍，《消费通论》在英国出版时，书名被牛津出版社改成了《新规律发现与应用》，原因是这本书探讨了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对经济运行当中消费领域深层次问题有新的创新、新的研究、新的说法。“消费拉动经济，是一个全社会的行为，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各方面的措施出台，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各个领域都有拉动和推动的重要因素，这样我们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和深化改革的发展轨道就越行越近。”李连仲表示。

清华大学教授王文林认为，走向消费主导战略有赖于政府转型。消费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型，面临着诸多深层次体制矛盾和多方面结构性失衡的挑战。这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大都与政府转型不到位直接相关。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增长主义的特征，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以增长取代发展，以经济发展取代社会发展，以短期目标取代中长期目标，确实需要通过政府转型来解决。

李锦认为，消费主导论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人为本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实践。这一思想与凯恩斯主义是作为对立物出现的。在相当长时间，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主要任务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揭露与批判，建立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理论体系。

我国最大炼焦煤企业进军杀猪行业，计划年宰猪 200 万头

国企“杀猪”是转型还是转向？

■ 孟书强

2012年，“猪”似乎成了一些大型国企的新宠，也成了社会议论的焦点。人们对武钢养猪事件的争议还没有完全平息，山西焦煤的加入再次把非议推向了新的高潮。

6月11日，这家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优质炼焦煤生产企业和炼焦煤市场主供应商，和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签署合作协议，正式进军杀猪行业。

双汇集团网站显示，双方将在太原市阳曲县开工建设生猪屠宰加工项目，计划年屠宰生猪200万头，加工肉制品10万吨，销售额将达30亿元至40亿元，项目力争一年内建成投产。

继3月份武钢集团宣布投入390亿元发展非钢产业，其中准备建万头养猪场，之后，山西省属大型国企山西焦煤集团也把目光转向了“猪”，不同于打算养猪的武钢的是，山西焦煤准备投身的是杀猪行业。

有分析认为，武钢养猪是无奈之举。近年来，国内钢铁企业可谓是在普遍微利的状态中求生存。“中国钢铁行业销售收入利润率近年来持续下滑，已从2007年的7.26%降至2011年的2.42%，处于全国工业领域最低水平。”在2012年中国金属制品行业技术信息交流会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首席分析师迟京东这样描述正在艰难“过冬”的钢铁行业。

整个钢铁行业在今年出现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行业亏损的局面。2012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第一次信息发布会上，中钢协副会长张长富坦言：“现在由钢铁生产主业亏损变为行业亏损，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行业亏损。”中钢协发布的数据显示，钢铁行业一季度亏损企业亏损额达到90.98亿元，亏损面达33%。

公开的数据显示，武钢的日子很不好过。2011年武钢总利润约35亿元，其中钢铁主业利润不到15亿元，而非钢产业利润为20.8亿元，占到整个集团利润的六成左右。而在销售净利率方面，非钢业务约3.5%，钢铁主业则不到1%。非钢业务的利润空间超过钢铁主业，被外界认为是加大非钢业务投资的主要原因。

当下煤炭企业的日子虽然也不是很好过，但显然要比钢铁产业好得多。相对于武钢的“借猪求生”，山西焦煤集团更多是考虑到“产业转型”的因素。

山西焦煤集团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煤种最全的炼焦煤生产企业，焦煤生产能力稳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二。其产品除焦炭外，还有甲醇、烯烃、醋酸、聚甲醛等煤化工产品。在山西最大的五家煤炭集团当中，山西焦煤集团利润最高，因此，山西焦煤也成为山西省推动省内煤企壮大非煤产业的先锋。数据显示，2011年山西煤炭行业实现非煤收入3312亿元，占到煤炭行业收入的59%。但是，多数大型煤炭集团的非煤业务仍然围绕煤炭行业展开。显然，这并不利于山西省由资源大省向现代产业大省的转型。

山西焦煤集团进入和煤炭产业完全不相关的食品产业，可謂是山西煤炭产业发展非煤业务向前跨了一大步。据媒体报道，这次双方的合作最初完全是由于河南和山西两地政府的“牵线搭桥”。据此，相比武钢来说，山西焦煤这次和双汇的合作在更大意义上可以说是产业转型的需要。

双汇技术经验丰富、山西焦煤有钱有人，又是当地龙头企业，对市场有极大的影响力。一旦促成两家大型国企在生猪屠宰加工方面的合作，地方政府可以不花分文，既解决就业，又不愁税收。就如山西省副省长郭迎光认为的，此次合作将有力推动山西畜牧业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民增收致富。

大型国企的非相关多元化之路一直以来备受争议。之前武钢养猪的消息传出时，就有不少学者批评武钢此举是典型的不务正业，甚至指责武钢是“辅业复辟”，是走回头路，重蹈国企“大而全、小而全”的覆辙。

山西煤炭是转型还是改变发展方向，引起社会热议。一位国资委人士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国有企业的布局仍然偏宽，不够集中、不够突出，需要通过有进有退的方式进一步收缩战线。近年来国资委强调国企“做强做优”主业，对辅业项目要求进行严格报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曾坦言：“作为一家企业，只有专注于主业，并通过改革获得抗周期风险的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近两天，网络上对国企养猪、杀猪的评论如潮。比如来自哈尔滨市的徐小侠发表评论认为，“这种政府‘拉郎配’式的‘经济增长’，貌似是30年前被大规模批判的；这不是市场经济，是开历史倒车！”

另有前瞻网议论，“不论是山西焦煤杀猪还是武钢养猪，其实都属于不务正业。在中国企业史上，绝大多数不务正业的企业下场都不好，最后要么巨亏退出，要么被非主营业务拖垮，特别是国企更是如此”。

养猪杀猪，岂是国企所为？

■ 张荟婷

武钢养猪，在两会上披露引来一阵炮轰，余波未平，又传来山西焦煤“杀猪”的新闻。

值得注意的是，“杀猪”的行业巨头还有中粮集团、复兴集团、联想等等。而且，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业巨头做出如此重大转变也都是这几年的事情。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行业利润不断减少的状况下，不论是养猪的武钢还是杀猪的山西焦煤，都难逃“主业不好，就去开发副业”的嫌疑。这一则和国资委的要求不符，也受到社会的批评。既然是国企就应该干国企的事，岂能与农民抢饭吃。再说，荒了自己的地，种了人家的田，人家肯定有意见，都这样做，市场就会大乱。

其实，国企养猪并不具备优势。除了国企缺少养猪杀猪经验外，养猪行业的周期性也是人们对大型国企投身养(杀)猪行业的一大担心。养猪业的波动性不可预测，这也是投资的大忌。养猪业本身的养殖门槛不高，但波动周期短，且不可控。行业一窝蜂地涌入就会造成价格下降，反之，一旦大批量离场退出，价格又会迅速上扬，要踏准这种周期节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大型国企投身养(杀)猪业的担忧。

什么是正确的做法？坚守主业，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强化管理，由做大做强向做强做优转变，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要紧的是沉得住气、挺得住劲，度过艰苦的冬天，迎接春天的到来。

策论

铁道部如何迎来“民营”春天

■ 张荟婷

近日传出铁道部正在谋划成立投资、建设、运营三大集团的消息。随后，铁道部回应称“成立三大集团”的消息纯属造谣。这则消息与民营进入极有关系，尤为引人注目。

媒体报道的铁路系统三大集团具体方案为，铁路投资集团公司未来主要负责铁路建设领域的融资和投资，铁路建设集团主要负责铁路项目的规划、建设、施工等，铁路运营集团则由铁道部的运输局剥离后成立，主要负责下属运输公司的各项运输内容及对全国运输实行统一指挥。

媒体的言之凿凿与铁道部的“造谣”之说显然十分矛盾，让我们抛开诸般纷扰，对铁道部迎来民营的可行之

路进行探讨。

自铁道部宣布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以来，民营并无大规模进入迹象。究其原因，是铁道部的高负债率与现有的体制环境使得民间资本望而生畏。

事实上，铁道部已经举步维艰。据铁道部财务审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铁道部负债率升至60.62%。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铁道部从银行融资的渠道几乎被封，在社会融资方面，由于铁路体制的政企不分，多数社会资本不愿进入也难以进入。

铁路部门欲借外力解近忧虑，必须先行给予民间资本确信的权力保障与收益预期。因此，我们提倡的“鼓励与引导”不在于外，而在于铁路系统自身切实转变部门职能，加快铁路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首先，铁路系统政企分开势在必行。我们可借鉴德国模式成立铁路总公司，逐渐分离出客运、货运等不同板块，实现管理清晰化，并把城际铁路等建设权下放给地方。比如京津城际高铁，其融资建设是由北京市、天津市及部分大国企共同出资成立的公司负责进行，建成后委托给铁路部门来运营。这种模式分解了集中于一体所带来的混乱之风的现象，有利于地方铁路发展从而带动整个铁路线蓬勃发展。

其次，要建立统一、高效而透明的股东管理体制，各方股东权利平等，风险共担、收益共担。中国已经有了第一条民营的货运线路广汇线，在短途资源区内的货运线路方面完全可以参照这种方式，让民营出资、建设、经营，铁道部抓住调度保证线路正常运营即

可。同时可以考虑以合资公司的形式，让民营真正享有作为股东的管理权与分红权，而绝不仅仅是让铁道部下属公司眼睛盯着民营的钱包，手里掌握着管理的权力。

再次，引入独立的审计机构，同时考虑到铁路建设的特殊性与公益性，可以由铁路部门先将线路安排到整体铁路网之中。如此一来，不仅有利于铁路网络调度和预防招标过程中的腐败，更重要的是，也有利于推进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

由此观之，“三大集团”的成立与否只是一种方式，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以市场化发展为导向，走体制改革之路的种种变革，才是能够真正吸引民营大规模进入铁路系统的有力举措。